

上 编
中国—东盟关系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 一 章

中国—东盟相互依赖

冷战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迅速发展，双方的合作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等领域，合作的深度也在日益加深。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的合作正在继续推进，而且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合作提供了动力。本章试图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合作产生的原因、动力、发展前景。

一、国家间的合作与利益分配

每一个国家都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与他国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是各国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各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无止境的追求，直接导致了国家间的不信任、摩擦，甚至是战争。“各国都拥有自主权，没有更高一层的权威来控制各国的行为。在这个无政府体系中，国际行为者之间互相缺乏信任。互不信任使每个行为者必须在个体福利与集体福利之间作出选择。若信任别人，就有被别人利用之嫌。实际上这种情况与囚徒困境相近。”¹ 国家间关系中的囚徒困境，指的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国互相不信任，都怀疑他国在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形式。涉及两个行为者。每一个行

为者都被假定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自助者”。²克服“囚徒困境”的最好办法，便是促进国家间信任与合作。在国际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国际合作，是因为通过合作能够克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囚徒困境”。

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开展合作时，都必须考虑它们之间如何分配收益的问题。换言之，在国家间的合作中，有一个谁受益和受益多少以及合作的成本如何分担等问题。一国不仅要享受合作的获益，而且也要承担合作的成本，如何分配合作利益及分担合作成本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合作能否持久地进行下去。一国从国家间的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可以分为绝对获益和相对获益两种。绝对获益，是指各国都能够从国家间的合作中分享到各种利益，相对获益是指由于各国大小不同、强弱不同以及在合作中的地位不同，而导致获益的分配也出现差别，有些国家可能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有些国家可能得到较少的利益。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同时又担心伙伴国会获益更多。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虽然可以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将会很困难，纵使建立某种合作关系也很难长期维持。这是因为，“在任何关系中，国家的基本目标都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互关系中能力的优势。”³一般而言，合作各方只关心“相对获益”。新现实主义代表肯尼思·华尔兹的如下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当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性时，处于不安全中的国家必须考虑利益将如何分配。这导致它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都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会更多？’在对预期的获益进行分配时，比如说，以 2:1 的比例进行分配，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获益，去实现或意在损害或者毁灭另一国的政策。只要双方都担心对方可能利用它增加的能力用于不利自己的政策行动，那么，即使双方绝对获益的前景很好，也不会引发合作。”⁴

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对相对获益的过分关注和追求，会从两个方面阻碍国际合作。首先，一个国家不愿意接受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不均衡的利益分布，从而限制了合作的范围；其次，合作者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大大降低了合作的兴趣与热情。“一旦采取相对比较，由共同绝对获益预期产生的共同利益就具有冲突性。……一旦相对获益变得更重要，两个行为者之间纯粹和谐的绝对获益，也会变成接近零和博弈式的冲突竞争。如果合作的余地仍然存在，协定的可行性常常变小，因为在相对获益下国家违背协定的情况增加。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相对获益减少国家合作的兴趣和维持协定的能力。”⁵

现实主义的观点还认为，国家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因为这种竞争关系，决定了每一个国家都对相对获益特别关注和提防欺诈，尤其是前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这样写道：“在绝对收益情况下，每一方关心的是自己最大化地占有利益，毫不在乎他国在交易中的得失。只有当他国行为影响到自己对权力最大化占有时，各方才会在乎对方。而另一方面，在相对收益的情况下，每一方不但考虑自己的个体收益，而且关心己方是否获得了较他方更多的收益。……每个国家无疑想使自己的绝对收益最大化。但对每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确保它在任何协议中都不会亏待自己，而且做得更好。然而，当国家把着眼点转向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时，合作就变得更为困难了。这是因为，关心绝对收益的国家必须保证，一旦馅饼做大后，它们至少能得到增加部分的份额，而关注相对收益的国家必须对馅饼的分配特别留心，这就使合作的努力复杂化了。”⁶

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对相对获益的过分关注和过分夸张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他们对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一般都持悲观的立场。一些学者批评现实主义目光短浅，只见树林，而看不见森林，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现实主义由一种直觉支配着，认

为相对获益将事务转化为高度冲突的甚至零和博弈的不能合作的情况。当只有两个国家的时候，这种直觉是对的。其错误在于不加区别地将从两个行为者的模式中得出的结论，泛化为任何多个行为者的国际政治状况之中。⁷⁷

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合作的，“当行为体为了回应或预期其他行为体的偏好而调整自身行为时，合作就可能产生。国家可以在明确的或默认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商讨进行合作。合作也可能是强弱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⁷⁸这种国际合作既可以是在某种霸权领导下的合作，也可以是建立某种较为平等的国际机制下的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促进国际合作的因素很多，包括，共同利益、国际机制、相互依存等，“即使在完全理性的、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的政府之间，合作也是可以获得的。”⁷⁹

新自由主义还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和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导致国际社会总是处于“囚徒困境”，而克服“囚徒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合作。“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形式，涉及两个行为者。每一个行为者都被假定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自助者。这种假定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关于主权国家的假设类似。在每次博弈中，每个行为者只有一次选择机会，面对的都是合作或者欺诈这一简单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可以通过欺诈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管另一方获益如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双方都采取欺诈战略，那么每一方的获益都不如双方采取合作情况下的获益。”于是，合作便是可能的，而且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中，要促进和保持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时间足够长，对每个行为者来说，最好的战略是坚持某种最初的慷慨（即在最初的行动中单方面采取合作），随后配以坚定的互惠。最一般的结果，正如哈丁认为的，是根据敌对对手的情形，选择自己

的机会和策略。……现在普遍认为，如果囚徒困境无限持续下去，或者又与该博弈参与者同时参与的其他博弈联系起来，那么发生的合作可能就是战略理性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行为者可以个别地从协调性传统中获益。这些传统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也可能是服从某个领导者或者通过某种中心化的努力形成的。在国际关系中，类似的典型传统是以互惠交易为基础的，其范围从国际法到制度规则。这种互惠形成国际关系互动的基点，并不顾及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固有性质而不断扩展。”¹⁰

新自由主义同意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但又指出现实主义的错误在于贬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国际制度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强调制衡力量的存在。这些力量促使国家保持承诺，从而解决囚徒困境。他们认为，各国可以采取‘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战略，以一定条件为基础进行合作。这就是说，只要其他伙伴这样做的话，每一方都将坚守承诺。他们也认为，如果囚徒困境能够重复，有条件的合作就容易实现。因为如果共同获益或者相互损害的互动重复发生，国家最终会发现共同合作是他们最好的长远战略。最终，如果相互退让和惩罚欺诈者获得的价值比共同行动的获益低，那么有条件的合作将更有吸引力。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可以实现有条件的合作。国家通过采取互惠战略，可以协调各自的利益、延续合作、减少检查和制裁的成本。”¹¹

那么，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合作呢？笔者认为，中国—东盟之间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础，是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条件下产生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促使中国与东盟坐到一起，促使他们求同存异，促使他们抛开各种纠纷，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在目前乃至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东盟将会更多地关注绝对获益，但是，东盟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国和弱国，他们在与中国合作时，

不能不更多地考虑相对获益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和强国，在与东盟合作时，也一定要照顾到小国和弱国的心态，使它们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相对获益。在国际合作中，小国更加关心它们的相对获益，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此，对任何两个国家来说，小国将更关注它们互动后果中的相对获益。为了解决小国合作意愿勉强的问题，大国可能给小国提供超过平均获益的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根据大国的兴趣，需要大国宁愿选择一个不均衡的合作性安排，也不愿选择不合作。因此，对大小不同国家之间关注相对获益的合作性安排来说，不均衡的绝对获益分配可能是必需的。”¹²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性质的合作，为了维护这种合作关系，中国宁愿做出一些牺牲，代价就是更多地照顾小国的相对获益。

在与东盟的合作中，中国面对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的关系。这也是国际关系中常常遇到的一个老问题。在当代世界里，虽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是，一国的国家利益与外国利益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仍然是一对矛盾，当面对这个矛盾时，一国将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呢？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一国在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时，如何处理与外国利益的关系，围绕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种基本原则，将会出现四种不同的选择模式：

第一种，绝对的利己主义，对他国的福祉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种，只有在别国的行为会影响本国的情况下才关注他国的利益。

第三种，既关心本国的利益，也关心他国的利益。基欧汉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因为这类国家大公无私，而是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因为不论别国如何行动，其收益的增长也会促进自身的利益，反之亦然”。

第四种，一国纯粹为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

对本国的物质利益和安全毫无裨益。¹³

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时代，中国曾经按照第四种模式来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例如，当年中国曾经本着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的理想向一些国家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和各种支持，甚至牺牲了不少人，换来的只是廉价的赞扬和口惠而实不至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而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却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无法正确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而且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行不通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际上放弃了第四种模式，转而采取第三种模式，即在关心本国的利益时，也关心他国的利益，在国际合作中强调双赢，即我们常常说的互惠互利。因为中国已经深刻认识到，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谁也离不开谁，一国在实现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时，也必须同时顾及他国的利益，起码是不要把本国的国家利益建立在牺牲或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正如基欧汉所说的：“当今世界，紧密交织的贸易与金融网络反映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它可以将福利效果，不论是好是坏，直接由一个社会传达到另一个社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行为者采取何种行动，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都构成了情势性的相互依赖关系。”¹⁴

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仍然处于蜜月阶段，双方将会更多地关注绝对获益，但是，在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成为强国，东盟国家可能会把关注的焦点从绝对获益转移到相对获益方面，他们可能会担心中国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相对获益。考察美国—日本经济合作的历史，对我们观察与研究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美国学者迈克兆头·马斯坦丹诺对美国—日本经济合作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日本崛起为第

二大经济强国之前，美国并不担心日本会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在 80 年代以前，美国很少关注相对获益，事实上它接受甚至鼓励了有利于日本的相对经济获益模式。……然而，在 80 年代后期，追求相对获益的行为开始明显地体现美国政策决策过程中。¹⁵当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后，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以及一般的老百姓都担心日本从合作得到更多的获益，利用相对获益，赶超美国。“在对日经济关系中，与其他方面相比，美国公民关注的是相对获益或者说相对地位。美国担心的是即使两国双方都从他们的关系中得到发展，但日本会比美国发展得更快、获取更大的市场和金融资产份额，或者在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领域控制美国。从长远来说，这种发展将对美国的经济福利、政治自治权甚至是军事安全施加威胁。正如赖克指出的，这种关注是美日关系中的黑暗面，然而他反映了美国人的思考，或者说，日本人也是这样思考的。”¹⁶如果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要避免发生美国—日本经济合作中出现的上述情况，那就需要双方增加理解与信任，尤其要求中国在合作中负担更多的成本与更多地照顾东盟各个小国的利益。也许可以这样分配合作的利益和成本：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承担更多的合作成本的同时，主要是获得战略上的收益，而东盟各国则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实惠。

二、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

自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东盟从经济领域开始合作，随着双方互信的增加，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也逐步展开，形成一种稳定和全面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确立，除了国际大环境和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促进之外，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及对长远利益的考虑更是

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美国学者查尔斯·利普森在题为“经济和安全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一文中指出，“国际事务中稳定的合作需要几个关键的因素：第一，行为者有关相互依赖和本身决策视对方情形而定的观念；第二，对其他行为者决策的监督和及时反应的能力；第三，对利益的长远考虑；第四，合作与欺诈所获报偿之间的适度差异”。¹⁷这一部分专门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探讨中国—东盟之间的合作产生的原因和发展前景。

何谓相互依赖*？相互依赖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状态，指一个国家的行为或政策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相互依赖的程度。自从有国家开始，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就存在，中国古代就有“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说法，实际上说的就是相互依赖。当然，在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比较小，进入近代，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把我们带进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现在常常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其含义也是指相互依赖。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中，对相互依赖的解释不尽相同。应该说，凡是国际关系学者在分析各种国际问题时都不能不涉及相互依赖这一现象，并且对它的产生和后果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相比较而言，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对相互依赖这种现象做了比较系统与深入研究。

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相互依赖被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世界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其他地方的某些人，或是所有的人造成影响。说相互依赖十分紧密或是正在迅速地变

* 有些译著译为“相互依存”，笔者认为，“相互依存”与“相互依赖”是同一个意思，为尊重译者，本文在引用时，两种提法均采用。——作者注。

得日益紧密意味着全球任何地方的发展都会对遥远的地方产生影响。¹⁸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从权力的角度将相互依存定义为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量，“从权力的角度看，相互依存意味着一国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国的能力。如果依存是相互的，中断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将会对双方都带来损害。这种相互依存概念决定核时代国家之间的相互威慑关系。任何一个核大国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另外一个或多个核大国不使用核武器摧毁该国的决定。这也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形式。在两个相互依存的国家间，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双方运用权力的成本和收益也会随之增加。”¹⁹ 罗伯特·吉尔平则把经济相互依存描述为一种“实力关系”和“经济力量”，“这种力量可被一个行为主体用来对抗另一个行为主体。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因此，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不同集团和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地建立起一种等级森严的、依赖性的实力关系。作为这一情况的对策，各个国家均在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立性，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²⁰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一般而言，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这种影响往往源自国际交往——跨越国界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²¹

约瑟夫·奈认为，“相互依存指的是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简单地说，它指的就是相互依赖。这样一个情势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的区别，只有程度大小之分。”约瑟夫·奈指出，可以从根源、收益、相对成本以及对称性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他把相互依存区分为物质现象和社会现象两种。“相互依存既可以产生于物质现象（比如在自然界中），也可以产生于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或者认知的）现象。物质上和社会上

的相互依存经常是同时存在的。”约瑟夫·奈尤其强调认知对相互依赖的影响和作用，他认为，认知方面的相互依存可以加强或缩小物质方面的相互依存。以军事相互依存为例，“军事相互依存就是产生于军事竞争中的互相依赖状况。这里有武器物质层面上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可能性而变得十分明显。然而，相互依存还包含认知上的重要内容，认知或者政策上的变化可以减轻军事相互依赖的程度。美国人一点都不担心英国或者法国的核武器，因为他们不认为英法的核武器会被用来攻击美国。同样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西方人开始睡得更安稳一些。这并不是苏联核武器数量减少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人对苏联的敌意或者动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²²

相互依赖的后果如何，是促进和加深国际合作或者是相反，这是国际关系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相互依赖不仅不能促进国际合作，相反，它会导致一国利用其技术、资金、资源或者其他方面的优势控制其他国家，甚至左右一些国家的政策，从而增加了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的可能性。肯尼思·华尔兹这样写道，“正如其他国际政治概念一样，相互依赖在我们的理论中也有着不同的含义。许多人似乎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紧密程度不断提高，和平的机会也将增加。但是，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最残酷的内战以及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在高度相似而且紧密相连的人们之间。除非潜在的参战各方具有某种联系，否则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如果相互依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偶尔也将诉诸暴力。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央控制的发展，相互依赖也会加速战争的来临。”²³

另一些学者更多地从经济与市场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小，市场的作

用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正在取代国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把那些相互依赖的国家连在一起，共同行动。约瑟夫·奈批评这种观点是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只从双赢或者正和的角度认识相互依存，即每个人都获益、都比过去好。这样的分析家没有注意到利益的不均等以及相对收益分配所导致的冲突，因而忽视了相互依存的政治层面。……一些自由主义分析家错误地认为，随着世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合作将取代竞争。他们的理由是，相互依存导致共同利益，共同获益又鼓励相互合作。”²⁴另一位叫海伦·米尔纳的学者对这个观点做出如下评价：“在这种模式中，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就像一个完美的市场。许多相似的行为者，以产生某种均衡结果的方式共同行动。沟通、了解其他行为者的可能行为以及制度性惯例，都变得不重要。这种体系的结构是通过某种看不见的手，来决定适合国家的行为模式。”²⁵总之，这种观点的致命弱点，就是过分夸大了市场的作用，把相互依赖所产生的结果完全理想化了。

基欧汉和奈认为，华尔兹等人的观点过分夸大了相互依赖所导致的冲突，而第二种观点则过分夸大了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和谐，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关于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基欧汉和奈作了如下的阐述：

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同时存在冲突与合作两种可能性。奈从收益的角度把相互依存分为“零和”与“非零和”两种类型。奈认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既包含了竞争性的零和 content，也包含了合作性的正和 content。当利益的分配出现零和的情势时，国家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当利益的分配出现正和的情势时，国家间会产生和谐。“在零和的情势中，你的所失就是我的所得，反之亦然。在正和的情势中，大家都获益；在负和的情势中，大家都受损。分馅饼属于零和情势。做一块更大的馅饼属于正和情

势，而把馅饼扔到地上则属于负和情势。”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一般都是处于零和的情势（或状态），即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即便有一块更大的馅饼，人们也会为争得最大的一块而进行争斗。即使处于相互依存状态的国家可以共同获益，它们也可能为了利益的分配而发生争斗。……经济相互依存也可能被当作一种借口来使用，比如利用贸易制裁来对付塞尔维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相互依存的确比武力更好使用，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种等级，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比较低。……甚至生态相互依存也可以被当作一种武器使用，比如 1991 年伊拉克放火烧科威特的油田和把原油倒入波斯湾。国家之间也会因为全球生态问题而发生冲突。”²⁶

相互依赖并不一定导致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国际机制，只有在国际机制的约束下，相互依赖才能产生持久和稳定的合作。所谓国际机制，又有人叫国际制度，拿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或者叫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它包括各种国际惯例、规则、国际法等。“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调节行为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或受到该网络的影响。我们将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称为国际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国际机制是正式而全面的；在其他情况下，国际机制是非正式的、不全面的。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因时而异、因问题领域而异。……国际机制可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例如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对国际货币所作的安排；国际机制也可以产生于没有付诸实施的正式安排计划，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计划建立国际贸易组织未果，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脱胎于此计划。”²⁷如前文所述，相互依赖的增加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冲突，而国际机制则对解决这些冲突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国际机制对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国际经济进程赖以产生的政治框

架。”²⁸ “国际制度通过设置议程和确定问题领域，经常制定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交易规则。”²⁹

三、中国—东盟相互依赖的程度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中国东盟的相互依赖经历了从以战略与安全的相互依赖为主到以经济相互依赖为主的发展演变。相互依赖领域的增加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的前半段（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均处于敌对状态。从 70 年代初开始，中国—东盟关系发生的重大转折，导致这种转折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环境和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包括：中美关系缓和，中苏交恶，美苏竞争加剧，苏联积极支持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随着国际环境和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东盟国家面对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不再是红色中国，而是咄咄逼人的越南。为了对付越南的威胁，东盟与中国结成了战略上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随着国际环境和地区格局的变化，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了战略与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东盟依赖中国来制衡越南，遏制越南的扩张主义，中国也需要借用东盟的力量来制止越南的不断膨胀的霸权主义欲望，在东南亚地区实现战略平衡。于是，中国—东盟迅速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威胁——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地区格局的变化，中国—东盟在战略与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逐步减弱，而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开始产生并且逐步加深。中国—东盟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表现在双方在贸易、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来往的增加与扩大。

在贸易方面，1993年双方的贸易额只有 88.7 亿美元，2002 年增加至 547.7 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 5 倍多。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在 2002 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额占其进出口总额的 8.8%，仅次于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从东盟方面看，中国目前是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在 2000 年，东盟各国对中国进出口占东盟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 3.9%。在相互投资方面，截至 2001 年，东盟各国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达 17972 个，投资总额达 535 亿美元；同期中国向东盟投资 740 项，投资金额为 6.55 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目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估计今后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人员来往方面，在 2000 年，到中国访问的东盟旅客达 170 万人，比 1995 年的 110 万人增长了 54.6%，同年到东盟访问的中国旅客为 190 万人，比 1995 年的 80 万人增长了 1 倍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今后到东盟访问的中国旅客还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单位：千美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文 莱	/	37.1	152.2	115.4	0.0	0.0	244.2	22,270.0	127,741.3
柬埔寨	/	/	/	/	/	/	/	285,985.0	224,984.2
印 尼	1,249,494.1	1,280,043.2	1,741,717.8	1,867,758.2	2,123,041.2	1,832,034.4	3,338,942.2	4,321,848.9	3,490,998.1
马来西亚	1,202,628.5	1,859,707.4	1,806,866.6	1,519,935.5	1,313,812.7	1,545,082.2	4,595,865.8	6,433,437.9	6,229,130.5
緬 甸	/	/	/	/	/	/	65,076.9	86,525.3	103,700.5
菲律宾	173,874.0	163,967.0	212,938.6	327,921.7	244,411.6	343,682.6	2,521,925.8	2,570,611.5	2,372,582.0
新加坡	1,902,697.9	2,000,065.8	2,439,216.6	3,214,704.8	4,195,491.8	4,059,714.3	12,718,557.3	16,236,398.3	16,140,398.9
泰 国	/	/	/	543,696.6	1,291,132.0	1,422,072.6	3,231,764.2	5,077,586.6	2,862,555.1
合 计	4,528,694.5	5,303,820.5	6,200,891.8	7,474,132.2	9,167,889.3	9,202,586.1	26,472,376.4	35,034,663.5	31,552,090.6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网站 <http://www.aseansec.org>。1999 ~ 2001 年中国的统计数据包括香港地区。

* 根据东盟秘书处公布的统计资料计算整理。